

中国与波兰 1956 年十月事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当时采取的政策,对 1956 年十月事件中波苏关系的进程及解决危机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们密切注意波兰事件,尤为关注波兰统一工人党与苏联共党间日益加剧的冲突。1956 年 9 月,他们明显支持当时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爱德华·奥哈布与苏联闹独立的做法。在十月的关键时刻,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抵达华沙企图利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内部矛盾,以直接武装干涉相威胁来阻止波兰党拟议中的领导层人事变动及政策变化,中国则出面反对这种干涉主义行径。中共的政策实际上带有大国主义的意图。中共领导人虽对波兰部分摆脱苏联控制的做法表示赞赏,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波兰的民主与动乱,主要却是想利用这种局面迫使苏联领导人以平等伙伴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党和国家。在达到目的并制止了苏联对波兰的干涉后,中国人对哥穆尔卡的影响随之减少,并劝阻哥穆尔卡不要实施过分的自由化,也不要使波兰同苏联拉开距离。

长期以来,有关中共领导人对苏及对波政策的一些细节一直是严加保密的。文革时期曾从中国透露了一些消息,某些文件也在波兰公诸于众,但仍有许多重要情报至今封存于档案馆内。

以下公布的由时任波兰驻华大使斯坦尼斯瓦夫·基里洛克报回的两份材料,对阐述上述问题至关重要。这就是 10 月 27 日和 12 月 4 日的两份密码电报,它们虽在文献资料中曾被提及,但全文尚未发表。其中 10 月 27 日电报尤具特殊意义。哥穆尔卡当时正是由此首次得知中国对苏联干涉波兰持反对态度的,他也因此才更清晰地理解了苏联代表团在贝尔凡德尔宫会谈中的所作所为及在会谈最后阶段转变立场和意外妥协的原因。他意识到,有利的国际环境是他取得成就及波兰十月事件获得成功的重要乃至最重要的原因。

如同汇报与毛泽东谈话的第一份电报一样,第二份电报提供了有关事件进程的更多细节,也使中国的动机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它同时明确无误地指出了中方支持哥穆尔卡的限度与条件,在周恩来 1957 年 1 月访问华沙期间似更确切地提出了这些条件。上述两份电报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独特的政治生活习惯进行了一些曝光,如在深夜两点约见大使与刚睡醒的主席谈话等。

本文第三篇材料是米契斯瓦夫·马热茨介绍中共领导人对波兰事件态度的其它一些情况,其中包括爱德华·奥哈布在中共八大期间同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内容及他本人 10 月末与邓小平、刘少奇和朱德的谈话内容。米契斯瓦夫·马热茨当时担任波兰党中央轻工业部长职务,系出席中共八大的波兰代表团成员。谈话由巴尔托什·马切依·马热茨整理而成,未做改动。电报中保留了中国姓氏的原来拼法。

安杰伊·维尔布兰

请于 48 小时内退回机要处

密码电报 17599 号¹

北京发出时间:10 月 27 日 13 时 00 分

机收时间,1956 年 10 月 27 日 12 时 15 分

机要处收到时间,1956 年 10 月 27 日 14 时 10 分

¹在文件首页有以下一些批示:1、拉帕茨基的批示:除政治局委员外是否还需发送他人,请酌定;2、于星期日凌晨送达政治局;3、1956 年 10 月 27 日 20 时已将草译本送达各收件人通讯处。

特特急

哥穆尔卡：

我于 27 日深夜 2 时应邀前往中共中央会见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和张闻天等领导同志，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毛泽东请我就 1949-1956 年间波兰发生的一些偏差缘由向他做比较详尽的介绍。我依据三中、七中和八中全会的有关资料向他谈到政治、经济方面的错误和偏差所导致的后果及违背民主基本原则的一些情况，还谈到贝利亚现象及其波兰代理人造成的危害。我说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内存在一些离心势力，他们违背全党和人民的意志，意图使我党脱离民主化和自由行动的道路。

我谈了在八中全会上选举新的党中央领导后我们所进行的伟大变革和取得的胜利，这次全会为实现您在报告中和全会决议中提出的进步和民主化提供了保障。我还说：波兰生活的民主化将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同苏联共产党以及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结盟。

毛泽东问及您个人的一些情况，我向他介绍了您在战前、占领及解放后时期的活动，以及各种指责和逮捕对您造成伤害的情况。

毛泽东称，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了解了您的讲话和全会的决议，完全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赞赏我党在分析了六年计划的成就和错误后所制定的经济纲领。中国同志认为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他们满怀信心地予以支持。当苏联同志问及时，中国同志称他们对波兰的改革持肯定的态度。

10 月 19 日至 22 日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从苏共中央政治局获悉的各种信息中觉察到苏联同志并不赞同波兰党八中全会的纲领，他们对波兰的变革持否定态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了修正立场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请中共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如有可能也请中国代表团前往华沙。

本月 23 日，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经过会谈说服赫鲁晓夫肯定了波兰政治变革的正确性，并表示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领导人。

赫鲁晓夫同志和苏共政治局反对撤出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反对遣返苏联的军事顾问及指挥官，他们担心波兰党政治局将免除罗科索夫斯基担任的国防部长职务。

毛泽东还阐述了中共政治局的如下立场：

尽管苏共政治局持保留态度，但波兰开展工作的自主性问题不容置疑，因为苏共政治局本应剔除那些在社会主义阵营关系中所惯用的活动方法和形式。

毛谈到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残余。在将于 11 月 8 日举行的苏联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之间的工作会议上，应该根据新的原则确定波苏两党的合作基础。对于撤走苏联军队问题则引发了某种疑虑。根据毛的看法，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和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显示的高度政治智慧以及您在群众大会上痛斥敌对份子的讲话，均为完全控制局面提供了保障，工人阶级的态度也证明了这点。撤军问题的性质则要广泛、深刻得多。毛泽东对我们阵营中一些政局及自身力量尚不足以维持政权的国家会不会也仿效波兰提出同样要求而表示担忧。在与反革命斗争时期纳吉的要求证实了上述论点。

中共政治局赞同您有关苏联军队有必要留在民主德国问题所做的评价，最担心在苏军撤出波兰后是否会在民主德国出现类似局面，而这将意味着对我们阵营构成严重危险。

毛泽东认为，尽管苏共抵制八中全会提出的政治和经济问题方针，但必须承认这些方针也是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一种延伸。毛泽东请我们仔细斟酌一下，在实施八中全会这些方针时，其他事情能否分阶段进行，目前要苏军撤离是否正确，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动摇华沙条约的存在。

毛指出，我们必须联合起来尽最大努力说服苏联同志，但我们也必须在党际关系及我们自己的国家中表现出宽容态度。我们不能容许敌人利用我们阵营内出现的裂痕。中共无意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只有在波兰党领导人发出邀请后，(中国)代表团才能前往。这样做就是希望中国代表团的访问不致为帝国主义中心所利用。

基里洛克(签名)

请于 48 小时内退回机要处

密码电报 19477 号

北京发出时间：1956 年 12 月 4 日 18 时 00 分

机收时间：12 月 5 日 8 时 35 分

机要处收到时间，12 月 5 日 11 时 00 分

直接送达本人

拉帕茨基：

12 月 3 日我请求安排拜会毛泽东，当天即受到接见。会见和递交邀请信时在座的还有朱德、刘少奇、陈云、彭德怀和 Wan Czen Tien.

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邀请。他问及邀请是否有特定期限，是否可以认为在他方便的任何时候均有效。他不能接受所建议的日期，因为周恩来要到 1 月底才能回国。要前往波兰而不在莫斯科停留是不可能的，而毛泽东又不想在莫斯科停留，因为自他访问莫斯科后的七年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一直未曾回访。毛泽东曾多次被邀请访莫，他接受了邀请，同时却在等待回访。

目前双方正在商谈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具体日期。在伏罗希洛夫访问之后，毛赴波将是可行的。

在充分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于大选前访波的意义时，毛建议可以另行邀请周恩来于 1 月 10 日前后访波。

毛在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问题。在评价波兰形势时，表示完全支持和赞赏我国现领导的政治路线。他表示，在十月心里一直存在有关我们今后发展的一些疑虑。由于我党采取了正确措施已经完全化解。毛称，中共领导一直密切关注波兰形势的发展。他强调，他们经常阅读我国领导人，特别是哥穆尔卡所有原则性的讲话。它说他完全赞同哥穆尔卡在每次讲话中表述的政治纲领。他说自己在 1934-1945 年间也曾是中国的哥穆尔卡，但他的命运却有别于哥穆尔卡，因为他避开了那些奉行斯大林主义路线的中国同志所施加的迫害(这里指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毛对哥穆尔卡的活动作了正面的评价，同时也注意到哥穆尔卡未曾对持错误立场的同志进行迫害，表明哥穆尔卡并未借助斯大林主义的陈旧方法来开展工作。中国领导人对那些犯过错误的同志也持相似的态度，在八大上选举王明和李立三进入中央委员会就是例证：毛还评价了共产国际的活动，认为它只在两个时期是正确的：一是列宁在世时期，二是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的时期。毛对哥穆尔卡在莫斯科会谈时所采取的方式予以肯定，毛认为波兰代表团表现出了政治智慧，一方面突出了建立在正确基础上的合作与同盟的意义，同时也让苏联同志有可能放弃原有的伪善立场。毛还问及波苏关系中一些原则性的经济问题是否均在谈判过程中得到解决。毛详细谈到中国共产党对波兰十月事件的态度。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支持波兰统一工人党独立自主解决波兰事务的权利。毛为了说明问题还援引到刘少奇

的话，说苏联同志不了解波兰形势并准备诉诸武力，捷克和德国同志也持类似立场。苏联同志要中共领导也支持其使用武力。毛指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联的意图，并希望立即派遣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当面阐述中国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被接受了，这是我们整个阵营取得的胜利。苏联在波兰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源于下述事实，即苏联同志较之于中国人和波兰人更难于理解某些问题。这是由于他们自 30 年代以来在内外政策中一贯采用大国沙文主义方法所致，苏联同志通过共产国际和情报局对其他政党指手划脚，现在让他们运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式是困难的。毛说，波兰统一工人党帮助苏联同志找到了正确的工作方式，10 月 30 日的声明就验证了这一点。毛指出，必须借助党与党之间的批评，同时又注意捍卫苏联免除帝国主义攻击的做法，才能进一步对苏联共产党施加影响。

定于 1 月份举行的周恩来与布尔加宁的会晤将有助于实现后一个目标。毛特别关心波兰的大选、选举法及我们对大选结果的评估。毛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采取措施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是正确的；在与右派集团划清界线的同时又做出某些妥协让步的举措也是正确的。他同时提到了中国的经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里有十几位党外人士担任部长职务。

毛在结束谈话时说：“我很希望访问波兰，以便将来在向马克思和列宁汇报波兰革命人民的成就时能不负重任。”

我强调指出波方的邀请在毛方便的任何时候均有效。

毛和在座的所有中国同志均请转达对哥穆尔卡、萨瓦茨基以及波兰政治局的衷心问候。毛还由衷感谢波方的邀请并十分希望访问能够成行。

基里洛克(签名)

米契斯瓦夫·马热茨谈中共八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于 1956 年 9 月 15 日至 28 日在北京举行，该党在此期间曾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及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势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一些迹象表明该党在与苏共闹独立，同时又说明中共正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独特方法。预示文化政策自由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在波列斯瓦夫·贝鲁特去世后，波兰的政治危机在苏共二十大影响下逐步加剧，导致了 1956 年 6 月波兹南的工人运动被血腥镇压，人们关注着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新动向。

在波兰党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四名代表中，唯有时任党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及党中央轻工业部长的米契斯瓦夫·马热茨依然健在。我向他就中共八大对波兰形势的影响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

巴·马热茨：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都以极大的兴趣期待中共八大的召开。

米·马热茨：当时我被列入波兰代表团名单时确实很高兴。代表团于 1956 年 9 月 11 日离开华沙，由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奥哈布率领，成员包括中央委员奥斯卡·兰格教授，费朗契舍克·约齐维亚克也是中央委员。当时在北京任波兰驻中国大使的斯坦尼斯瓦夫·基里洛克也参加了代表团。

巴·马：谁接见了代表团？你们在访问期间会晤了哪些人？

米·马：毛泽东曾先后三次接见了我们（第一次是全体成员；此后只有爱·奥哈布一人参加），此外，我们每个人还分别会见中国的领导人。我曾同刘少奇会谈。

巴·马：波兰在 3 月至 10 月间所发生的一切对中共领导似乎都具有某种意义，是这样吗？

米·马：我们甚至未曾意识到波兹南事件会对处理上海工人抗议事件的决定产生影响。

毛泽东在同我们的谈话中强调指出，他向波兰人学到了很多东西：“波兹南对他来说是一种警示，我们起初曾将上海事件视作反革命事件，但在接到我们驻华沙代表的电话后就改变了看法。我们不得不把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召来出席政治局会议，并做出了考虑工人要求的决定。情况如何呢？他们是有道理的。第一书记带着新的决定返回上海，落实了工人们的要求于愿望，上海的秩序一夜之间便恢复正常，每当我想起上海就会联想到波兹南，想到安定，想到我们大家都必须与工人阶级保持联系。”

巴·马：“我们大家”？共产党中国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苏关系危机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米·马：我向你透露一个或许史学家们尚不知晓的事实，爱·奥哈布是在比我早三个星期的10月1日返回波兰的，我是八中全会以后才回国的。当时国内形势迫使爱·奥哈布匆忙回国，但面对东道主的好客，我们代表团的部分成员不得不继续留在中国。我也留了下来，并到中国南方和西部地区参观了三周。我在正式道别后登上了飞机。当飞机好像已准备起飞时，发动机却突然熄火了，舱门内出现了我们熟悉的翻译。“马热茨同志，请您下去一趟。”他们把我领到机场贵宾接待室，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刘少奇和朱德已经在那里等候。

巴·马：感到意外吗？

米·马：这是何等的意外呀！我震惊了。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对我说：“我们请您向波兰党领导转达我们的敬意及对你们进行变革的钦佩之意。我们要强调地是，我们完全支持波兰共产党人为纠正错误所作的自主努力，并祝愿你们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取得成就。”他接着强调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将向苏共政治局通报我们对波兰进行变革的态度。他补充说，波兰完全可以指望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结束谈话时他说，“我们将向你们提供3000万美元的无偿AA贷款以作日常需要。”我向中共领导的友善之情表示了感谢及钦佩，并请他们相信我理解了刚才谈话的份量，回国后将立即向我党领导作详细汇报。在回国后我立即同爱·奥哈布联系，向他报告了我在机场上听到的一切。根据他的指示，我写了一份单独的谈话记录，之后发送给了党中央领导人。

巴·马：您如何看待中国人的态度？

米·马：怎么说呢，我本人是十分满意的。爱·奥哈布在与我谈话时也指出：“我们是一个弱小的民族，况且又与苏联接壤，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既要同中国，也要同我们阵营的其他国家保持密切的合作联系。但首要任务是要向苏联同志讲明我们的行动及争取支持是正确的，然而这项任务却不轻松，它将落在维斯瓦夫同志的肩上了。”

巴·马：你们在中国访问期间是否脱离了国内问题的实际情况？是否意识到了波兰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

米·马：爱·奥哈布在的时候，国内一天两次及时向他通报，由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通过电话传递消息。他曾报告了有关波兰领导层人事变动的建议，以及关于提议将哥穆尔卡为波兰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一事的传闻。

我曾数次见证了爱·奥哈布这类的电话交谈。爱·奥哈布同志通话时对我及他的老朋友，一位战前的共产党员利沙尔德·泰帕拉欣斯基在场并不介意。我想在这里提及一个大约鲜为人知的事实，即给奥哈布打电话的还有爱·盖莱克，他用一种模棱两可的方式描述国内的局势，似乎是对奥哈布，又似乎是对变革的命运表示不安。奥哈布在第一次通话时对他的关心表示感谢，并说自己了解情况的，但在第二次通话中却责备了爱·盖莱克：盖莱克同志！您还是管好自己的事情吧。我了解维斯瓦夫，我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位共产党人。”

巴·马：波兰的十月事件已既成事实。就像我们的变革曾对中共政策产生影响一样，中

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对波兰变革进程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谢谢您的谈话。

巴尔托什·马·马热茨

1957 年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同周恩来的会谈

1956 年秋，由于波兰党八中全会的召开（10 月 19-21 日）和党的领导班子及政策变化，致使波苏关系出现危机，人民中国在此过程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在此届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苏共领导人曾竭力要求延期并举行双边会谈，讨论准备进行的人事变动和政策变化。鉴于上述建议遭到当时波兰党领导人的拒绝（时任中央第一书记的是爱德华·奥哈布，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已从 10 月 12 日开始参加政治局会议，15 日即被政治局委员会提名为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苏联代表团 10 月 19 日即抵达华沙，其成员包括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及一批高级军事指挥官。随同代表团的肯定还有伊凡·科涅夫元帅，据某些渠道称还有朱可夫元帅，虽然他并未参加同波兰领导人的会谈，苏联此举的直接意图是要遏制波兰计划中的变革，认为这些变革是同苏联的利益相矛盾的。在代表团抵达的同时，驻扎在波兰西部地区的苏军两个师兵力也在向华沙推进。

苏共中央领导人在启程前往华沙时，将军事干涉波兰的意图向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作了通报，即中国共产党、德国社会统一党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放弃干涉意图并立即就此问题进行高级会谈。² 以当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及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 10 月 23 日至 31 日访问了莫斯科。据我了解中共的行动是受中国利益所驱动的，其目的在于迫使苏联采取伙伴式的态度对待这一亚洲大国。波兰的危机只不过是为此种行动提供了一个契机，但它却对波兰具有直接而积极的意义，对促使苏联放弃干涉意图并导致哥穆尔卡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哥穆尔卡于 10 月 27 日收到波兰驻北京大使在同毛泽东一次深夜长谈后³发回的电报中得知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计划的。

1957 年 1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赴欧洲。他于 1 月 7 日抵达莫斯科，11-15 日访问波兰，同哥穆尔卡进行了历时两天的会晤，稍后在对 1 月 15 日公报作最后定稿时同哥穆尔卡举行了一次会谈，接着他又到布达佩斯停留了一天。10 月 17 日他重返莫斯科，19 日回到北京。周恩来亲自向毛泽东汇报了此次访问的情况，其汇报稿不久前在中国和美国发表。（注 3、周恩来向毛泽东的汇报稿已由■■■■■■■■■■根据中国版本于 1996 年发表在华盛顿《■■■■■■■■■■■■■■■■■■■■》上。摘要稿参阅安·维尔布兰：《扼杀前的恐惧》，载于《每周评论》1996 年第 11 期。）

同周恩来的会谈是八中全会后第一次与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直接接触，而且是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向自己的中国盟友通报有关波兰党新领导人同克里姆林宫争论的立场。从以下公布的谈话记录可以看出，哥穆尔卡对同中国总理的会谈是十分认真的，他十分广泛地阐述了波兰党中央八中全会前后的波兰形势及 1956 年 10 月 19 日同苏联代表团会谈的过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波兰档案馆里尚未收藏比这更为详尽的有关波苏会谈的记录和报告。据我从那些会谈参加者在世时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当时波方未做会谈记录。不排除苏方有记录稿的

²关于中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行动及其后果请详见安·维尔布兰：《中国人挽救了哥穆尔卡吗？》。载于 1991 年 10 月 26 日《政治》周刊。

³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斯·基里洛克于 1956 年 10 月 27 日和 12 月 30 日同毛泽东进行了两次谈话。关于这两次谈话的 17599 号和 19477 号两份密码电报已经发表。请参阅安·维尔布兰：《中国和波兰十月事件》，载于《今日》，1996 年第 10 期。

可能，但迄今为止尚未公开。我们掌握的只有阿·萨瓦茨基在八中全会上所传达的简单正式报告，而且早在1956年第10期《新路》上发表。此外还有两份哥穆尔卡和萨瓦茨基⁴会谈时当场作的工作性零散手记稿。另外，在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的回忆录里也有一些关于同苏联代表团十日会晤的简洁叙述。据此，哥穆尔卡于1月11-12日同周恩来会谈时所用的是一份迄今所能找到的最详尽的全面的记录稿。

哥穆尔卡有充分理由对中国总理保持诚挚可信的态度。他知道，他在决定性的时刻得到了中国领导人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对他来说尤为重要。他也了解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情况，并且估计到这种紧张关系可能会对他有利，它可为波兰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争取到尽可能广泛的范围的自主和自治。

关于1日同周恩来的会谈记录稿，现存两种彼此略有差异的版本。一件保存在科学院档案馆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2541号卷宗），当时是由会谈记录人员整理并作为向党內高级干部传达用的；另一件保存在哥穆尔卡私人收藏物中。这份文件的基本内容也是一份记录稿，但哥穆尔卡对其作了十分广泛的补充，主要是对他个人的谈话部分亲自加了一些插话，哥穆尔卡还进行了其他一些修改，并对全文加了一个批注：“瓦·哥穆尔卡校正”。我们现在发表的正是这一版本，文中未作任何改动，中文姓名保留了当时的拼音，一些必要的说明刊载在注解中。

安杰伊·维尔布兰

中国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 1957年1月11日至12日⁵会谈记录

出席会谈的有：

波方：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萨瓦茨基、奥哈布⁶、萨姆布罗夫斯基⁷、拉帕茨基⁸、纳什科夫斯基⁹及波兰人民共和国驻北京大使基里洛克¹⁰等同志；

中方：周恩来、贺龙、王稼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等同志。

会谈于1月11日15时举行。

会谈由哥穆尔卡主持，并建议如下日程：

- 1、通报波兰形势；
- 2、就某些国际问题交流看法。

周恩来对所建议的日程表示同意。

哥穆尔卡：我代表波兰党中央领导对中共中央领导就波兰十月事件和波兰党中央八中全会所采取的友好善意和宽容理解的态度表示感谢。中国共产党表现出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迄今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向中共中央领导通报国内发生的一些事件，通报我党八中全会的过程及我国当前的形势，我们想在今天完成这件事。

[标志我国开始出现严峻形势的一个警报，便是波兹南的六月事件。工人们罢工和上街是

⁴安·维尔布兰与约·斯坦平：《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与苏联共产党代表团的会谈—1956年十月事件中鲜为人知的文件》，载于《今日》1995年第4期。

⁵实际上记录稿还包括一份双方于1957年1月15日对联合声明的讨论记录稿。

⁶爱德华·奥哈布（1906—1989），时任波兰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⁷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1907—1977），时任波兰党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

⁸阿达姆·拉帕茨基（1909—1970），时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波兰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⁹马里安·纳什科夫斯基（1912—1996），时任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¹⁰斯坦尼斯瓦夫·基里洛克，1952—1959年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党中央领导人执行了错误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同时证明党的领导脱离了党员群众，脱离了工人阶级。工人们上街的直接原因是没有兑现六年计划¹¹中提出的关于改善工人阶级生活条件而对工人所做的承诺。如果党的领导人能够同党组织和工人阶级保持紧密联系，也不至于发生罢工。党领导人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而在国家经济发展遭到重大困难时，我党没有在政治思想上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反而对他们采取了行政手段。

1948年以后，在波兰就出现了较为广泛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各种行为。国家生活中蜕化变质的明显表现就是在我们的安全机构中建立了特别行动局¹²，它事实上凌驾于党之上，实施对党的控制，进行毫无根据的迫害，甚至放纵挑衅行为。

外部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也加剧了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这里，我首先想到的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同志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攻击斯大林全部活动的报告，我认为它对我党，对整个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党的前领导人向党内干部公开了这一报告内容，甚至还在一些党组织内宣读。这对党是极大的震动。反动派也利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报告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了攻击。以上情况为国内外反动宣传影响波兰人民及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创造了适宜土壤。我国的波兹南事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深信，我党八中全会的召开防止了匈牙利局势在波兰重演。需要记取的是，我国形势的一个特殊问题是沙皇俄国在历史上曾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时至今日它一直是在波兰民族中有助于形成反俄情绪的一个因素。

二战后及在波兰建立了人民政权以后，我们为建立波苏友谊而尽了极大的努力，以同苏联保持兄弟友情的精神教育人民，还教育人民不要把旧的反俄传统转嫁到苏维埃政权身上，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要完全消除反俄情绪还嫌力度不够，这种情绪在今天的条件已经带有一种反苏的形态。必须指出的是，苏联对波兰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不利于我们努力营造波苏关系使其具有社会主义国家间所应建立的关系。

战争刚结束，在苏联士兵对待波兰人民的态度方面就曾产生了一些摩擦。然而，我们迄今未能最终克服和消除反俄传统的主要原因，则是波兰和苏联间没有形成一种平等关系，表现之一便是以所谓“赔偿”的名义向苏联供应大量的煤炭。这种做法并不是波茨坦协定规定的，而是苏联强加给波兰的。1945年由于苏联方面施加压力而签署了供煤协定，当时不可能把情况告诉人民群众。但米科瓦伊契克逃离波兰后却在外国公布了这一协定，于是被帝国主义宣传加以利用，以此削弱对我党和人民政权的信任。而我们却无法否认这些事实，这对国内形势极为不利。更有甚者，在苏联顾问的职责范围问题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局面。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顾问，但在我们一些国家机关里苏联顾问事实上却成为这些部门的领导者，占据了最高职位。他们对一系列法庭的错误判决以及毫无根据地处决十几名波兰军官一案而有直接的责任。要澄清对这些军官判处死刑的案件并认定这一错判的责任人却困难重重，因为两名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人沃兹涅先斯基¹³和斯库巴舍夫斯基¹⁴已被遣送回苏联。以上列举的情况有利于反动派营造一种舆论，即波兰不能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只能执行一种苏联认可的政策，这与真实情况完全不符，却在波兰人民中扶植了反俄和反苏情绪，而不利于党去克服

¹¹ 1950年7月21日通过的关于1950-1955年经济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六年计划。

¹² 由安东尼·费金上校领导的公共安全部第十局设立于1951-1954年期间，该机构早在1948年底已经成立，当时主管党的“内部安全”事务。

¹³ 季米特里·沃兹涅先斯基(1902-?)，红军反间谍军官，1946-1953年间先后任波军情报总局(即反间谍总局)副局长，局长。

¹⁴ 安东尼·斯库巴舍夫斯基(1915-?)，红军军官，1945-1950年间先后任副检察长，最高军事检察长首席代理，最高军事检察长；1950-1954年间任波军情报总局副局长。

这种情绪。

斯大林逝世后，还在苏共二十大召开前，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一般不能容忍波兰充当苏联卫星国的势力开始增强。苏共二十大后，两种政治倾向开始在我们党内形成：一种认为必须改变现状，党的活动必须依据独立自主的政治路线。然而代表这一倾向的同志没有提出自己明确的主张，也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问题；第二种倾向的表现是其主张者担心党的政策一旦发生变化可能在国家生活中引发各种反响。他们首先担心外部对我们内政的干涉，担心反动派强化对人民政权的攻击。

正是上述两种倾向转化成为党内斗争，使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丧失了开展有效活动的可能。党的第七次中央全会¹⁵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举行的，它通过了一些基本正确的决议，但面对党领导的无所作为，决议也就成为一纸空文，从而也造成各级党的机关和组织的消极懈怠态度。七中全会的主要缺陷是不善于在平等和主权基础上协调好波苏关系，而这正是全国众望所归的大事。党的一些领导人很清楚，如不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协调波苏关系就难以制止国家严峻局势的产生。

苏共领导人对我所谈的形势了如指掌，但他们并未从这种形势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苏联同志选择的是一条虚伪的道路，他们竭力对付深入波兰社会的反苏倾向。这一点表现在我党八中全会召开前一天¹⁶，苏联驻华沙使馆通知我们，说由赫鲁晓夫同志率领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将在全会开幕当天抵达波兰。苏共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向我党当时的中央书记奥哈布、西伦凯维茨等同志和我（虽然我当时还不是党和领导成员¹⁷）提出，要求我们同意代表团来波。我党领导人则向苏联同志提出，希望他们不要在八中全会开幕当天前来我国，因为这将增加我们的工作难度，并可能引起波苏关系的复杂化，但我们表示同意代表团在晚些时候再来华沙，甚至表示准备在中央全会结束后第二天就接待代表团。苏共领导不顾我们的这一立场，依然通过苏联驻华沙大使声称代表团将在全会开幕¹⁸当天抵达华沙，并表示希望我党和政府领导到机场迎接代表团。

我们把这一切理解为对我们的强迫和威胁。我们不愿导致局势恶化和引起难以预料的复杂化，于是同意苏联代表团来波，波兰中央政治局全体也决定前往机场迎接代表团。

后来发生的事件极其严重地影响了中央全会的进程，苏联同志，特别是赫鲁晓夫同志在机场上当即采取了示威行动。在场的有许多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北方集团军的苏联将军，苏联元帅科涅夫¹⁹也在场。赫鲁晓夫走下飞机后全然无视波兰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波兰政府成员，却先同苏联将军们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²⁰握手问好，然后才走到波兰代表团面前提高嗓门开始冲着奥哈布同志叫喊：“这绝对办不到！”并伸出手指向他做出粗野下流的动作。我们对此反应极为平静，不愿当着苏联将军和众多司机的面出现难堪的公众场面。然而我认为有必要抗议对奥哈布同志的攻击，以便维护奥哈布。苏联同志在机场上就要求中央全会延期召开。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此时全体中央委员已经集中在会议大厅等待全会的开幕。我们拒绝了中央全会延期召开的要求，同时请苏联代表团同我们一起去贝尔凡德尔宫，我们就在那里开始

¹⁵ 1956年7月18-20日和23-28日召开。

¹⁶ 即1956年10月18日。

¹⁷ 哥穆尔卡于八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即1956年10月21日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但他从10月12日起就已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¹⁸ 即1956年10月19日。

¹⁹ 伊凡·科涅夫(1897-1974)，苏联元帅，曾任华沙条约国联合武装部队司令。

²⁰ 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曾任波兰和苏联元帅，波兰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至1956年11月13日)。

会谈。

在贝尔凡德尔宫集中后，赫鲁晓夫同志立即宣称：“我们决定要对你们的事务进行强制性干涉，不容许你们的意图得逞。”面对这种独断行为，我答复赫鲁晓夫说，如果他不从桌上撤走这把决斗手枪，即不收回自己的威胁，我们就不进行会谈。我还问他来这里的目的是否来逮捕我们的。赫鲁晓夫称，他没这么说，也没有这种打算，但苏共决心为了保卫苏联的利益而进行干预。不顾我们的质问，他没有明确说明苏联有何理由要干涉波兰及苏联利益又受到何种威胁，而只是一般性地提到其意思是要保障经过波兰领土到达其在德国占领区的通道安全。

鉴于中央委员们正在另一幢大楼的会议厅里等待全会的开始，我们向苏联代表团提出要先到会议大厅主持全会，待开幕后先休会，然后我们再回到贝尔凡德尔宫同他们会谈。苏联代表团无可奈何地表示了同意。

我们把苏联代表团留在贝尔凡德尔宫后前往八中全会会议大厅，全会开幕后补选了几位同志进中央委员会，其中也包括我在内²¹。为了不使局势进一步激化，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向全会通报在机场同苏联代表团的会晤过程和在贝尔凡德尔宫的初步会谈情况。我们只是向全会提出为了继续同苏联代表团进行会谈而建议全会休会。这一建议获得全会的通过。

此后在贝尔凡德尔宫进行会谈的气氛稍许平和了一些。米高扬²²阐述了苏联代表团的看法，强调指出苏联在民主德国领土上拥有武装力量，对八中全会后可能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而造成苏联同这些部队联系困难甚至中断的局面表示担忧，并表示苏联方面绝对不能容忍出现这种情况。从米高扬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发言中看出，他们确信似乎波兰意欲退出华沙条约并脱离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莫洛托夫同志则表现出了尤为进攻性的立场。我方则向苏联同志解释，我党在八中全会讨论后所推行的政策变革只会密切波兰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加强而不是削弱连结波兰同苏联的纽带。同时我还强调波兰要保持同苏联的良好同盟关系，较之于苏联同波兰保持这种关系更为重要。在此我必须指出，此前我们曾向苏方做过详细通报，说明我们党内任何人都不想削弱同苏联的同盟关系。更无人要断绝这种关系。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我行我素地决定干涉。在会谈进行中，他们强行要求我们除哥穆尔卡同志进政治局外，不对我党中央政治局作其他变动。苏联代表团所采取的策略，其目的在于要分化波兰代表团的立场。苏联方面曾表示，在波兰确有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应该支持他们。这在我们代表团的某些同志中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并立即被苏联代表团成员们所利用。

在会谈进行中我们得到报告，驻扎在波兰的苏联部队已经开始向华沙方向挺进。面对我们“此为何意”的质问，苏联代表团们坚持说这是早已计划中的军事演习。我们向苏联同志表示，不管真实情况如何，这些“演习”在波兰社会的心目中都将被理解为对我党和政府所施加的压力，我们强烈要求停止部队的调动，并将装甲部队撤回自己的驻地。赫鲁晓夫当时指示参加会谈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要他向科涅夫元帅传达停止军事演习的指示，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与此同时，为数不多的波兰武装力量部队根据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指示也在向华沙方向调动。罗科索夫斯基承认，他这样做是想“保障华沙某些据点的安全”。但对于这项命令，他既未向波兰党中央政治局，也未向波兰政府报告，这是他自作主张的一种行动。

同苏联代表团的会谈持续了一整天，气氛极为恶劣，极不友好。我方言谈举止平心静气但又坚定不移，苏方则咄咄逼人。我们不断得到报告说，苏军仍在继续向华沙进发，同时一

²¹当时补选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有符·哥穆尔卡及其在1948年前的亲密合作者马安里·斯波哈尔斯基、伊格纳泽·洛加-索文斯基和泽农·克利什科。

²²阿纳斯塔斯·米高扬(1895-1978)，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些传闻开始扩散，说有数人被苏军坦克轧死，由此激起了波兰社会极度的亢奋情绪，与此同时苏军的战舰也开到我们的领海停泊。苏联同志却依然对我们要求停止施压的交涉不予理睬，到会谈快结束时，赫鲁晓夫同志才以平和的语调表态说，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只要波兰企图退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他们将被迫进行干涉。我们则再次向苏联同志保证，他们的担忧是毫无根据的，我党中央全会的决议也将会使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根据波茨坦协定，苏联有义务支付我们应得的战争赔偿，此事迄今尚未清理，为此我们在会谈中向苏联代表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要求。我们还要求苏联对在所谓“补偿”协议名义下供应的煤炭价格给予补贴；要求清理和制定苏联过境波兰领土的合理运费。苏联代表团称，他们准备研究我们的要求并表示同意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次日，苏联代表团返回莫斯科。军事演习被制止了，苏军也接到命令回到了自己的基地。机场上的告别仪式是在正常气氛中举行的。

对苏联代表团抵达波兰的消息及其在机场上对波兰代表团的挑衅言行，不可能严加封锁。苏联同志同我党政治局委员在机场发生争吵的消息迅速在华沙不径而走，致使气氛更趋紧张。甚至还有传闻说，还在苏联代表团抵达前，波兰正在酝酿一场政变。在工人阶级中酝酿着强烈的亢奋情绪。有的传说罗科索夫斯基正准备联手苏联军队开展反对内务军部队的斗争；有的则传说华沙市委已经动员起来，并将华沙各大工厂企业的工人投入应急准备。这些事件对我党和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我党政治局决定向全会通报同苏联代表团的会谈结果，但不向中央委员们谈及会谈中发生的那些不体面的事情。我们在全会上介绍情况的基调是说苏联同志到波兰来，主要是担心他们与驻扎在民主德国的苏军取得联系会发生困难。我们向全会通报说会谈促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并使苏联同志深信我们之间继续开展合作和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不存在任何障碍。在此之后，我们在工厂企业里依然听到了很多有关与苏联代表团会谈内容的疑问。我们还是决定不谈全部真相，在每次会议上力求为苏联代表团来波一事开脱，说他们关注我们的共同安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此后不久发生了著名的匈牙利事件，这又是造成我们内部困难的另一原因。

我们不愿向全社会，甚至不愿向党组织介绍苏联干涉我国内政的全部事实真相，否则将会使我国人民中存在的本已十分狂热的反苏反俄情绪愈益加剧。而这只是有利于反动派，却损害了波兰利益。因此，我们在公开场合和在党内阐述这种干涉时几乎只限于为其开脱。我们把苏联代表团不请自到的“访问”说成是苏联领导出于最良好的愿望和关心我国及华沙条约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而采取的一个步骤。

这样做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在波兰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反动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社会中相当多的人一直向往西方，指望政治变革会将波兰引向资产阶级民主道路；而一些打着米科瓦依契克波兰农民党旗号的反动农民领袖在广大农民中还有重大影响；还有一些法西斯占领时期在国内活动的服从于伦敦流亡政府领导的组织，其成员曾达数十万人，他们虽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一些成员却留存下来，因而一旦发生类似于匈牙利那样的苏联武装干涉，全国将陷于内战的烈火中，最终的结局很难预测。

为此我们必须谨慎从事。我党的八中全会已成为一件大事，它制止了反动势力和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根据匈牙利模式在我国挑起反革命武装事件的行动。八中全会上党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和党的新总路线的确定得到了劳动人民的广泛支持，缓解了紧张局势。

至于八中全会后的形势，需要指出的是，此前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从破坏国内的社会主义法制开始直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以及苏联对我国内部事务的干涉，

都在我党队伍中引起深深的迷惑和混乱状态，并导致了党内斗争的出现，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党的力量，甚至使我党各个组织的活动在很长时间内处于瘫痪状态。

当时党内形成的三种政治倾向深深地困扰着我们党的队伍。第一种主要的活动倾向是以中共八中全会决议为基础的起决定作用的倾向，因为八中全会的纲领得到了工人阶级和全社会的支持，此外我党领导团结一致，坚持八中全会的决议，绝不容许在党内形成其他的领导中心。还在八中全会前就已深入党内，全会后仍未消失的还有其他两种倾向，即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倾向在八中全会前就蜕化成为有组织的宗派并形成了自己的领导中心，此后由于八中全会的召开这两种倾向纷纷瓦解了。尽管如此，无论是修正主义者还是教条主义者都在利用党内民主，从宗派立场出发来反对八中全会提出的政治路线。

很难说这两种倾向中的哪种倾向对党的危害更大。修正主义者可以利用报刊杂志阐述自己的立场，而保守主义倾向则不具备这种条件。修正主义倾向在作家、记者、文化和科学工作者中间，还在部分大学生阶层中拥有最为广泛的基础，他们在报刊上撰文全面谴责波兰在过去十二年内取得的各项成就，还公开诋毁那些忘我奉献的党员为斯大林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在某些场合的所作所为简直是一种变节行为。这样一来，对斯大林主义的指控在党的干部周围形成了一种道德恐怖的氛围，从而削弱了我党干部的战斗性和抵御能力。修正主义客观上是在为反动派和反革命效劳，为实现他们的目的而撑腰打气。我们的敌人认为，八中全会是波兰政治变革的第一阶段，目的在于要恢复波兰的主权和国内生活的民主化。根据他们的如意算盘，现行的变革必将进入第二阶段，届时将对共产党员进行清算，继而由反社会主义势力接收政权。我党领导公开揭露了反动派的这一企图。

保守主义倾向的基础则是一部分党的机关及一些被裁减及调离工作的安全机构人员。党的机关由于改组而精简了将近一半，被裁减的这部分人一般赞同保守主义的倾向。八中全会以后，选举了包括省委一级在内的新党委，其结果是部分高素质人才因被指责为保守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分子而未被再次选进党委班子。还有一种情况是，早些时候从各级党委和党的机关班子领导岗位上下来的具有保守观点的人这次又被选进党委和党的机关领导班子。保守主义者的立场也是形形色色，其观点的共同基础乃是主观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那些被裁减的工作人员如果仍然留在原机关工作，他们中的一些人很可能也不会赞同保守主义者的。八中全会后开始出现一种不健康的做法，那就是向各种人群散发党的活动家未曾发表的报告和谈话，其用意在于动摇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在这方面，人们有时还毫无根据地指责某些同志为反犹太主义者。我党领导人作了很大努力来消除各种形式的宗派行为和党内的有害活动。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当时我们正处在议会大选²³的前夕，所以恢复党的行动纪律和团结显得尤为必要。

还在八中全会前就对选举法作了修改。人民统一阵线的候选人名单上候选人数，较之于相关选区应选的议员人数已有所增加。这就意味着一些不太知名的议员候选人有可能被选举人划掉而进不了议会，我们党员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大选运动中我们动员了一切力量，党的积极性最终有了改善，就全国范围而言，我党党员在人民统一阵线的候选人名单上占 52%，统一农民党党员占 25%，民主党党员占 9%，其余均为无党派人士，其中天主教活动家群体占据突出地位。选举纲领对所有党派和无党派候选人都是共同一致的，是由人民统一阵线全国会议通过的。当时我们未曾预料到，在今后的议会中会遇到来自我们结盟党和无党派人士议员某种不愉快的意外事件。何况正如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是通过议会选举道路夺取国家政权的，所以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也可以通过此种途径来剥夺共产党人的

²³第二届议会大选于 1957 年 1 月 20 日举行。

政权。

苏共二十大以后，特别是在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各种言论的背景下，我们党如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一样，面临着一系列意识形态政治和理论性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也正如生活所表明的那样，迄今尚未得到解决或被虚伪地加以阐述。这就必然会在党的队伍中引起各种不同的争论，也成为产生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一个根源。我们密切关注着各兄弟党对这些问题的一些论述，也仔细地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刊物发表的各种文章。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论述尤为关注。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引发了许多争论和分歧，其中尤其涉及到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形式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准确评价苏联出现的那些畸形现象，指出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和原因以及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对于制定一个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客观规律的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没能把共产党人武装起来投入到与社会主义敌人的斗争中，也没有教育他们如何在自己的活动中避免出现错误。

中共报刊文章中蕴含的许多思想符合我们的立场，有助于我们日常开展的活动，然而我党及我们的社会在经历了最近时期我国发生的一切事件后，却难以接受《人民日报》去年12月29日刊载的文章²⁴中对斯大林作用所进行的评价。我们绝不想说斯大林干的全是坏事，他也会做过许多好事，但我们认为中国同志未对斯大林活动的消极面给予足够的评价。

在评价铁托和卡德尔对苏联关系所持立场²⁵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基本一致的。前不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²⁶访问我国，我们曾对他们说，尽管南斯拉夫历经磨难，也不应该在苏联问题上采用如此方式表态。即使他们对苏联的指责事出有因，有所依据，但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也不应该公开表态，并把争议公诸于世，因为这只会帮助敌人而削弱我们的阵营。我们认为，尤其有害的是他们公开发表言论，似乎苏共领导内部已经分裂成为斯大林主义分子和反斯大林主义分子两派。我们还指出，他们在匈牙利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也并非是一贯的，起初他们同意苏军干涉，后来又改变了态度。与此相仿的是他们在联合国内也采取了不断变化的立场。我们认为有必要通过党与党之间的内部讨论来探讨彼此的立场，澄清有争议的问题。

南斯拉夫同志提出的主要指责是，苏共在铁托访问莫斯科后10天便向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发信，称南共联盟似乎已不再是列宁主义政党，而是社会民主党一类的党。此后他们还指责说，《真理报》发表的霍查文章似乎也是在苏联同志的指使下撰写的。南斯拉夫同志提出的第三个指责则是有关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向该党各级组织发出指示反对南共联盟一事，最后他们还提出了纳吉问题。

波兰党中央政治局的基本态度是，无论情况如何，南斯拉夫同志都不该做出如此反应，因为这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我们还告诉南斯拉夫同志，我们收到了苏共关于发表一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文件的建议，并表示将向苏共提出也向南斯拉夫党提出相同的建议。南斯拉夫同志则表示，如果向他们提出该建议，将在晚些时候对此表态。在南斯拉夫驻华沙大使²⁷前不久拜会我时转达了南共联盟对此问题的答复，由于他们没有收到邀请，因而将不参加发表该文件的协商，并不再表态。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应该保持党与党之间的双边关系，

²⁴指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一文。

²⁵指铁托于1956年11月11日在普拉的讲话和卡德尔于一个月后在南斯拉夫议会上的讲话。

²⁶南共联盟代表团由S·伏克曼诺维奇-坦帕率领于1956年12月19-29日访问波兰。

²⁷1955年至1958年间南斯拉夫驻华沙大使为米洛拉德·米拉托夫维奇。

如果情况有利且不会损害每个党的主权，也不排斥多党间的关系和协商。

在上面提到的《人民日报》文章中有关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从马列主义理论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并加以发展，将会有助于我们和其他党解决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任务和困难。

我们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我们阵营的团结，特别是关于一致对外问题上所持的立场。面对敌人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必须保持团结一致，对于彼此间存在意见分歧也应在阵营内部进行解释。我们对党的领导作用的观点也是一致的，根据自身的实践我们深信，党的领导作用愈是充分有效，就愈能扩大民主自由，发展国家生活中的社会民主。毫无疑问，只要党不遵守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软弱无力，民主化的过程就可能被反动派用来为其反社会主义目的报务。对于加强党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主义法制民主过程中的作用，我们给予充分的评价。毋庸置疑，在面对阶级敌人的目前阶段，我们是不能放弃行政手段的。

从以上所谈的我国和国内的形势，中国同志也许可以理解我们要评价匈牙利事件是何等困难。苏联同志在第二次干涉前曾问我们如何评价匈牙利形势，却又不通报自己的意图²⁸。我们认为，在当前难以捉摸的时期内苏联军队必须留在匈牙利。其出发点是这些军队的存在，对于制止霍尔蒂反动派夺取政权和使匈牙利不致摆脱社会主义阵营提供了最好的保障。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希望匈牙利新政府能在工人阶级中找到支柱。

最近举行了华沙条约国家五个党的会议来讨论匈牙利问题²⁹，他们没有邀请我党参加。在公报发表前一天，苏联驻华沙大使向我们通报了这次会议的情况，说考虑到我们的议会大选故未邀请我们参加。毫无疑问，即使我们参加也肯定不会改变会议通过这一决议的现实。苏联同志或许认为我们对形势的看法不同，不愿就此问题同我们进行争论。然而我们却感到未出席会议对外造成了不良印象，在这样一些活动中无视我们的存在，不但会不促进我们阵营的巩固，反而给西方的各种猜测留下了空间。

目前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相处正常。我们认为已对许多问题作了说明，对苏联同志所表现的充分理解表示赞赏。我们估计他们也得出结论，认识到以前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我们认为苏联同志也在真诚地执行建立在平等原则基础上的关系新方针。

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由于时间关系就此结束我的通报。

周恩来同志：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在群众大会的讲话中应该提出哪些问题。

哥穆尔卡：建议周恩来谈谈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开展保卫和平有效斗争的意义，苏联的和平政策，美国政策及其在中近东地区的干涉企图。还希望周恩来向波兰社会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中共政策开展和平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还可以谈谈我们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发展情况。

萨瓦茨基：建议周恩来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阐述波兰的政治和经济成就以及波兰在和平阵营中的作用。

萨姆布罗夫斯基：应该以中国的成就为背景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西伦凯维茨：建议再举行一次会晤来讨论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要点。

周恩来：我带来了毛泽东致哥穆尔卡、萨瓦茨基和西伦凯维茨的一封信，待翻译后再向

²⁸此处哥穆尔卡可能有误。1956年11月10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茨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布列斯特附近苏联一方的一个野战机场上举行了会谈。我们不掌握此次会谈的记录，但从当晚政治局会议的讨论中可得出结论，预计苏联要对匈牙利进行军事干涉；因而他们采取反对态度。详见安·维尔布兰：《伊·纳吉的命运使哥穆尔卡受惊》一文，载《法律与生活》1991年第43期。

²⁹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于1957年1月1日至5日在布达佩斯举行。

你们递交。

感谢你们关于波兰形势的详尽介绍。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十月事件中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列主义原则的。波兰同志的立场促使苏共扭转错误立场，这是他们惯犯的毛病，波兰同志帮他们治了病。中国共产党支持波兰党 10 月 21 日的立场，当时波兰党的八中全会已经通过了自己的决议，因而主要功绩归于波兰同志，中共只是起了稳定的作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应该建立在马列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彼此有平等的权利。苏联在去年 10 月 30 日发表的宣言中也承认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支持这一立场，我们现在力求依据上述立场开展工作。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应该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在波苏关系中过去曾有过许多不平等现象，现在已经得到纠正。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波兰统一工人党没有与苏共采取的立场开展公开争论，否则将会削弱我们的阵营。波兰统一工人党没有煽动民族狂热情绪也是正确的，你们采取的策略使争论问题得以解决，而没有进行公开辩论，否则也会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在去年 12 月 29 日的“声明”中，我们强调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均应通过不同方法予以解决。我同意哥穆尔卡同志关于平等和主权的意见，但也不应该忘记苏联的先进作用，首先是他们的先进作用，而平等和错误是次要的，毛泽东在同基里洛克的谈话中正确地强调指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像兄弟间的关系，而不应该像过去苏联与波兰之间那种如同老子和儿子的之间的关系，我们曾向苏共说过，他们处理兄弟党关系的态度并非始终正确，但我们也不认为应该公开讨论这个问题以使苏联遭到削弱。错误不应反复重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苏联的先进作用和巩固团结来反对敌人。

(周恩来接着谈到中国共产党过去所犯的 error 和善于纠正错误的情况。)在消除错误和毛泽东接替党的领导后，我们同苏共采取的立场曾多次发生分歧。他们嘱咐我们要停止与蒋介石的斗争，因为这将导致民族的毁灭。斯大林叮嘱中共要与蒋介石和解，停止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却未予置理而坚持斗争并取得了胜利。解放以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斯大林不信任别人，怀疑一切，认为唯有他的意见才是最正确的。斯大林担心中国会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并且担心中国也将处于美国影响之下，毛泽东会成为中国的铁托。这是我们党所不能接受的。

尽管苏共有许多错误，我们也应该看到反法西斯联合斗争的必要性，斯大林犯了许多错误，例如解散波兰共产党，使波兰同志受到极大委屈，又如对南斯拉夫的态度。然而在全面评价这些问题时，不应该只看到斯大林的错误，也应看到他对革命运动的巨大贡献。对所造成的伤害是可以理解的，但它不应起主导作用。面对斯大林的态度时，毛泽东也会有被伤害的感觉。斯大林已经逝世了，但要充分评价他的功过是非还为时尚早。再过一段时间我们才能从历史的高度做出更为充分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斯大林还是功大于过。

至于个人迷信，不应从斯大林身上，而应从集体和苏联所创立的这种制度身上去寻找原因。斯大林在国际革命运动中曾起了重大作用，尽管他犯有错误，还是可以利用他的著作教育工人阶级。如果苏联同志做了错事，就应该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我们在这方面有一致的立场。如果兄弟犯了错误，那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去克服错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道路和总路线则是一致的。

我们同意哥穆尔卡同志的意见，南斯拉夫同志采用了公开批评苏联的不妥做法，而把自己的经济标榜为独一无二的模式也是不正确的。我们大家都还年轻，必须探索各种道路，但是作为一个最早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还是应该借鉴苏联的经验，我们必须承认苏联的领导作用。为了我们阵营的团结一致，我们必须联合行动。我们各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必须相

互帮助。如果苏联犯了错误，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纠正。首先我们必须是有相互的信任感。

(通报国际形势和他最近对亚洲各国的访问情况。)

最近一段时间内，从匈牙利事件和对埃及的侵略来看，国际形势趋于某种紧张。尽管英国、法国和以色列遭到失败，反革命也在匈牙利被镇压，但形势还是紧张的。然而，我们认为仍有可能使世界力量再度保持均衡。我认为目前看不到世界大战的直接危险，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对在战争中能否获胜并无把握。美国总要从这种形势中为自己获取尽可能多的利益，英国和法国侵略埃及失败后，美国竭力想取代他们在中东的地位，美国也想把苏伊士运河控制在自己手里，这又与英法两国的利益相互冲突。英法两国企图利用社会主义阵营内中的暂时困难(指匈牙利事件)，他们意识到苏联此时此刻无暇更多关注其它事务，于是对埃及实施袭击，竭力想占领苏伊士运河并推翻纳赛尔政权。苏联和整个和平阵营的立场是能够挫败帝国主义企图的，但为此需要采取团结一致的行动。帝国主义者企图在国际讲坛上并在联合国内利用匈牙利事件败坏苏联和平政策的名声。尼赫鲁在同艾森豪威尔会谈中声称，他不赞同苏联对匈牙利进行干涉，但为了不致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他认为也不该人为地煽动这一事件。尼赫鲁说：艾森豪威尔对英法的行动很不满意，因为这使西方失去了对匈牙利形势干预的可能性。实际上英法攻击埃及却创造了条件，让我们去帮助匈牙利人扼杀反革命。艾森豪威尔在同尼赫鲁会谈中谈到了匈牙利事件，他公开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无能为力，不愿挑起新的世界大战。关于埃及问题，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将帮助清理苏伊士运河，保障运河的通航自由，并将协调解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争端。尼赫鲁则对我(周恩来)说，美国深刻关注对远东和中东的渗透，向这些国家，特别是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尼赫鲁告诉艾森豪威尔，美国所提供的巨款援助将带有侵略性质，这将激起阿拉伯国家人民的不满，这种援助只会为这些国家的上层带来好处。

艾森豪威尔则向尼赫鲁保证，美国无意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贷款来伤害印度，对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也不会被用来反对印度。对于尼赫鲁提出的不要在亚洲建立军事集团建议，艾森豪威尔未置可否。根据尼赫鲁的说法，美国在苏伊士运河和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尚不明朗。毫无疑问，美国希望巩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但目前尚未透露自己的计划。

在同尼赫鲁再度会晤时，我们讨论了美国在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中所宣称的立场，它清楚地表明美国希望占据法国和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尼赫鲁说，艾森豪威尔未向他通报上述情况。我们很早以前就说过，美国把英法两国挤出中东，有两点可以说明艾森豪威尔的活动：首先想扩大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和削弱英法的影响；其次是担心阿拉伯国家向社会主义阵营靠拢。

我们认为，目前世界可以划分为三个阵营：帝国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国家，即亚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这些国家拥有中立倾向，由民族主义者领导)。中国共产党认为，应该争取对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中的欠发达国家施加影响。吸引它们同我们社会主义阵营一起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支持这些由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然而我们没有能力向他们提供军备贷款，同中国接壤的国家对我们怀在很大的好感，但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也发现他们有某种担心，即中国今后会不会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会不会蚕食他们的领土。

两年半以前，中国联合印度和缅甸发表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后来这些原则又在万隆会议得到了发展，并在亚洲各国人民中赢得了广泛支持。最近，中国又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问题上向缅甸做出让步，承认了1941年蒋介石同缅甸就此问题签署的协定，尽管这一协定对我们不利。缅甸领导人曾问我们，以后会不会向缅甸派遣军队，当时我向他们声明：我们将

根据共同签署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而这是五项原则所不容许的。

尼赫鲁认为，不应该干涉匈牙利的内部事务，应该允许匈牙利人根据自己的意愿确定自己的内部关系。尼赫鲁也同意匈牙利继续留在社会主义阵营，这将有损于世界和平。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³⁰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尼赫鲁还认为，在别的国家，即使是友好国家内驻扎外国军队是会引起该国人民不满的。我曾问过尼赫鲁，当时是否还有其他道路可供选择，他没有回答。我向尼赫鲁指出，这是匈牙利请求苏联提供援助的，也就是说这种干预是合理合法的。我还向他指出了波兰完全不同的情况。波兰没有请求帮助，而是依靠党、军队和人民的自身力量，并根据自己的意愿实施了变革。尼赫鲁认为，波兰确实依靠自身的力量进行了正确的变革，然而他对把纳吉遣送到罗马尼亚一事表示反对。我答复说，在印度也把阿卜杜拉总理关进了监狱³¹。（周恩来向参加会谈的波方人员补充道，若是在我们那里，会当场逮捕纳吉）尼赫鲁问道，社会主义阵营是否也不容许归属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国家脱离我们，我向他声明，我们不容许帝国主义分子在我们阵营中开展敌对性活动和颠覆行为。我同尼赫鲁谈上述问题 是坦诚布公的，他对此表示满意。

为了击败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一切阴谋，社会主义阵营必须团结一致。为此，需要利用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一切矛盾来挫败他们的计划，加剧他们的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认为，应该作好准备来回击帝国主义对我们阵营任何一个国家的入侵。我认为，再过几个五年计划我们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得到切实的提高。另外，半殖民地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也将对我们有利。中国的意见是，应该避免同帝国主义者的一切武装冲突，但我们对这些国家在策略上则应该是坚决的。如果他们侵略我们，应该给他们以坚决的回击。

美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推行承认“两个中国”的方案，我们绝不容许把中国分“裂”为两个国家。这里不能同德国、朝鲜和越南的情况进行类比。我们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将做出一切努力使其回归变成现实。我们感谢波兰在联合国舞台上始终不渝地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应有席位而进行的斗争，同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急需在联合国占有席位。目前的状况不仅不会阻挠我们的政治活动，反而为我们批评美国提供了更大自由。在联合国内没有中国的席位，遭到削弱的并不是中国而是联合国，所以我们并不急于加入联合国，我们可以等待。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我们主张和平解放台湾，但也不放弃使用武力。我们同美国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他们要求我们放弃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日内瓦的会谈不管其结果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尽管我们尚未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但正在同他们发展关系，美国竭力利用某些亚洲国家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某些印度人纵容达赖喇嘛不要回西藏，竭力扩大对西藏的颠覆，要求西藏独立。我很快将就此问题同尼赫鲁举行会谈。

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凌弱惧强，艾森豪威尔最近对尼赫鲁的一次谈话就是一个例证。他说，在匈牙利问题上不允许再有大动作。我在柬埔寨同西哈努克会谈时曾暗示他不要屈服于帝国主义国家，因为我们能够给他提供援助。他就是这样行事的，拒绝参加马尼拉集团。我认为这是同欠发达国家合作的一种正确形式。

社会主义阵营团结是我们政策的基本要素。由于偏差和错误，伙伴间的不平等使得我们阵营的内部关系恶化了。这已是老毛病了，过去我们没谈过，近来又有所暴露。苏联去年 10 月 30 日的宣言和中国去年 11 月 1 日的宣言使不平等现象和错误得到纠正，为根据主权和平等原则建立新的合作形式提供了基础。哥穆尔卡同志谈到了赫鲁晓夫及其他苏联同志在华沙

³⁰克利希纳·梅农(1897-1974)，时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

³¹谢·穆罕默德·阿卜杜拉(1905-1982)，曾数次担任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政府总理。